

# 布哈林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当代价值

仲 帅, 陈 坤

(哈尔滨工程大学 思政教研部,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布哈林在1925年发表的《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耗费和政权蜕化的危险是取得领导权的必要性, 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为取得领导权提供了可能, 无产阶级在文化上尚未成熟, 这是取得领导权的现实要求。布哈林的文化领导权是指无产阶级领导国家进行文化建设的能力、影响力和潜在力量。他提出了取得文化领导权的方法, 一是正确对待意识形态的“同路人”, 二是加强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 三是坚持党的一般领导和开展广泛的竞赛。从中得出三点启示: 第一, 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第二,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和包容性; 第三, 加强宣传干部队伍建设。

**关键词:** 布哈林; 文化领导权;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D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42X (2014) 04—0028—04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4.04.006

布哈林在1921年写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 系统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 葛兰西在《实践哲学》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批判。有学者认为, 葛兰西“与布哈林学说的批判性对话对他的学说(指文化领导权思想——笔者)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sup>[1]</sup>1923年, 布哈林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一文中, 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讨论了无产阶级的文化原则。1925年, 布哈林在《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一文中, 又详细论述了取得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可能性和现实要求, 并提出了取得领导权的具体方法。这些思想内在关联, 是一个有机整体, 构成了布哈林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布哈林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一、取得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必要性

### (一) 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耗费和政权蜕化的危险

布哈林指出, 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相

比较, 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文化问题。在封建社会中, 资产阶级可以凭借特殊的经济地位发展自己的文化教育事业, 并且可以形成比封建地主阶级更为发达的文化。所以, 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 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可以很容易掌握和运用国家机器。然而, 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不可能形成比资产阶级更高的文化, 那么, 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 由于无产阶级不懂文化或者文化水平不高, 在管理国家时不可避免的会犯很多的错误。那些掌握文化的阶级也会消极怠工。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耗费。布哈林指出: “工人革命的这些额外的巨大耗费, 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工人革命的特性。”<sup>[2]91</sup>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 文化上落后的阶级要想维持统治, 必须依靠其他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力量, 由此就出现了复辟的可能性。关键在于, 一个文化上落后的阶级不可能长期统治文化上先进的阶级, “经过一段时间, 就会发现, 这些占据高位、压迫着文化较高的民族的胜利者, 被人家从下面削弱了<sup>[2]96</sup>”, 这使得无产阶级政权存

\* 收稿日期: 2014-04-28

**作者简介:** 仲帅 (1988—), 男, 江苏徐州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陈坤 (1961—),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HEUSZB1406); 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HEUSZB2206)。

在蜕化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强调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极端重要性。

## (二) 无产阶级专政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布哈林在批评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将是一个长期过程的重要观点。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过于乐观,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很快就要到来。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短暂的过渡时期,现在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建设没有必要,因为还没有等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好,无产阶级连同他的国家都要归于消亡。到那时,我们要建设的不是带有阶级性质和特点的文化,而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全人类的无阶级差别的共同的文化。布哈林批评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指出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他忽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二是没有看到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平衡性。他指出,苏维埃俄国的建立正处在被四周的帝国主义包围的特殊境地,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还在为夺取政权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了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以统治阶级的形象和面貌为标准形成起来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将具有自己的特征。”<sup>[2]339</sup>

## (三) 无产阶级尚未成熟到可以独立掌握文化领导权

布哈林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绝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sup>[2]346</sup>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发动暴力革命取得历史意义的领导权,但是,面对文学、艺术、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独自掌握领导权。原因在于,一方面,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没有发展自己文化所需的经济条件和必要时间;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实行教育和文化垄断政策,使得无产阶级在思想上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无产阶级不可能在剥削社会里形成比统治阶级还要发达的文化。这就决定了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管理文化事务会显得十分笨拙。所以,布哈林指出,无产阶级“正处在虽已取得政权,却尚未成熟到可以掌握文化领导权这样一个时期,”<sup>[2]346</sup>那么,提出取得文化领导权的任务也就势在必行、顺理成章了。

## 二、布哈林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内涵及实现路径

### (一) 正确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同路人”

“同路人”这一概念是托洛茨基在1923年首次提出的,它代指无产阶级作家与资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一个作家阶层,布哈林称之为“非无产阶级作家”。布哈林指出,要取得文化领导权,就要正确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同路人”,他反对像对待敌人那样通过阶级斗争的暴力方式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批评那种“既没有丝毫分寸感,还采取了过火的策略”的方法,主张正确对待“同路人”要采用改造和一定时期内和平排挤的方法。“同路人”虽然不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也不是阶级敌人,与无产阶级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此外,“同路人”是掌握文化的一个作家阶层,在无产阶级作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造“同路人”的思想,利用他们在文学上与无产阶级联合,为无产阶级文化事业服务。对于那些不合作甚至搞破坏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和平排挤的方式,从文化领域中予以“驱逐”。

### (二) 加强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

布哈林指出,要加强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首先要克服共产党在文艺政策上的两个缺点,一个是共产党人的自大狂,另一个是丧失立场。共产党人自大狂是列宁最为深恶痛绝的问题,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独自领导文化事业,哪怕是其中的一个部门。有些共产党人却自大到对文化问题指手画脚,不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工作者,“这意味着,我们从开步走的时候起便可能把事业毁掉。”<sup>[2]349</sup>在文化事业上丧失原则和立场,将无法保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存在把文化发展引入歧途的危险,意识形态的党性和阶级性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在布哈林看来,“真正的困难在于无产阶级必须转到文学、文化诸多领域,并由此以自己辛勤的工作来赢得他们本身在社会中的领导权。”<sup>[3]</sup>因此,自我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干部,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化干部要努力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并用它来教育广大工农群众,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更好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三) 党的一般领导和开展广泛的竞赛

布哈林指出,党对文化的领导是方向、路线和原则的领导,是总的、一般的领导,不是具体的领导。之所以确定这样的文化政策,主要原因有:第一,党暂时还不具备实施全面领导的能力,布哈林说:“我们还有一系列东西不懂,而且我确信,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也不可能学会这些东西。”<sup>[2]349</sup>

第二,文化发展有其固有规律,要尊重文化工作者,不能违背文化发展规律和对具体业务横加干涉。布哈林强调在文化领域要开辟更广阔的竞赛天地,其原因在于:一是文艺有其特有的形式和风格,只有以竞赛的方式才能促进文艺的不同形式、风格、流派竞相发展。二是文艺发展要推陈出新,创造新的形式和风格,也需要开展广泛的竞赛,竞争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布哈林鼓励成立各种文化团体,只要坚持在党的一般路线指引下,“能成立多少文学小组和团体就成立多少吧。”<sup>[2]351</sup>由于布哈林将坚持党的一般领导和开展最广泛的竞赛视为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坚持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文化界“各种文化艺术团体蜂起,各种艺术主张并立,各种学派争雄,大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sup>[4]</sup>

### 三、布哈林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能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已成为有效驾驭意识形态领域、不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关键问题。”<sup>[5]</sup>布哈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取得领导权的方式方法也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但是,布哈林的思想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感,通过汲取布哈林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有益成果,以期对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有所裨益。

#### (一) 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布哈林指出,文化领导权问题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全,不能形成和保持自己的文化并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国家政权就有丧失和蜕化的危险。布哈林在近一个世纪前提出的重要观点,时至今日依然发人深省。我国清末思想家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二》中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典籍是一个民族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这说明,文化与国家兴亡密切相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认为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既包括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表现出来的软实力,在信息时代,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将更为凸显。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21世纪世界大国的角力,将被文明的竞争和冲突代替。西方学者为文化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就调整了意识形态和文化

战略。之所以发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悲剧,其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守住意识形态阵地。近些年,发生在突尼斯、苏丹、也门等非洲国家的不流血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是西方意识形态战略的延续,西方国家甚至妄图将所谓的茉莉花革命引入到中国,它们一刻也没有放弃对我国进行西化的图谋,在国际上与我争夺话语权,对中国形象进行妖魔化,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手段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这必须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警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sup>[6]</sup>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系统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他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sup>[7]</sup>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是对文化安全和总体国家安全关系的最新认识和精辟论述,这表明,文化安全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文化安全对总体国家安全发挥着保障作用。

#### (二) 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包容性

布哈林认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取得政权,不等于取得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取得,不能通过强制的行政力量。他提出了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具体方法,一方面要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另一方面,还要正确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同路人”,善于利用已有的、其他阶级的文化,服务于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我们的党是在中国执政并将长期执政的党,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根本之策还是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包容性。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党的指导思想,是立党立国之本。当前,用马克思主义引导社会文化思潮的难度加大,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跟不上人民群众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需要。实际上,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许多问题,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及时作出很好的回答,而是由外国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观点替我们回答了。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对中国的实际问题作出最深刻的回应,谁就能赢得群众,吸引群众。当前,一些问题的研究流于

表面,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到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没有作出有价值、有力度、有说服力的回应。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sup>[8]</sup>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解决“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并指出:“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sup>[9]</sup>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研究国家和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主要任务,“回避现实中的重大问题,离开了社会实践,就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sup>[10]</sup>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有许许多多抓住事物根本、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有益成分,这些文化思潮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需求,而且丰富和繁荣了我国文化市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得益彰、互为补充。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积极主动的吸收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无论是传统的中华文明,还是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西方文明,马克思主义以其彻底的科学性能够最大限度的包容,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来,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异彩纷呈、兼容并蓄的特点和优势。

(三) 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良的宣传干部队伍

布哈林在取得文化领导权的方法中提出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他指出,要克服共产党人的两个缺点,一是丧失立场,二是自大狂。这对党的宣传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政治素质过硬,即“要敢说”,二是业务能力精良,即“要会说”。当前,我国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尖锐,亟待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良的宣传干部队伍。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只要进行正面宣传,给党和政府点赞,就会遭到一小撮人的口诛笔伐,扣帽子贴标签,群起而攻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宣传干部却视而不见,我们的一些媒体机构却默不作声,岂非咄咄怪事?出现这种现象,说到底,还是我们的宣传干部立场不坚定,党性观念不强。是一些干部爱惜自己的羽毛,看重自己的“名声”,紧张自己的政治前途,害怕别人说三道四,说长道短,其实,这是过于计较个人的厉害得失,置党的利益于不顾。我

们的宣传干部只有站稳立场,胸怀坦荡,才会底气十足,无惧流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鼓与呼,是无上光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sup>[11]</sup>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靠前指挥,把那些敢于为党和人民发声的干部提拔到宣传工作的重要岗位上来,我们的宣传媒体也要为这样的干部加油鼓劲。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复杂,光有“勇”还不够,还要有“谋”,这里的“谋”就是宣传干部的工作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干部要工作能力,“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sup>[11]</sup>提高宣传干部的工作能力,一要推动宣传工作走向科学化、专业化、专门化,避免外行领导内行;二是宣传干部要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分析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突出矛盾和重大现实问题,不断掌握强大的理论武器;三是广大宣传干部要掌握宣传工作的政策、策略和方式方法,提高网络舆情的监控和宣传能力,提高新媒体技术的开发和运用的能力,努力使自己成为符合意识形态斗争新需要的新型宣传干部。

#### 参考文献:

- [1] 邱运华. 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中介与形式内涵——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文艺问题 [J].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005 (8): 183.
- [2] [俄] 布哈林. 布哈林文选: 上册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8.
- [3] [苏] 罗伊·麦德维杰夫.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 [M]. 段稚荃,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66.
- [4] 郑异凡. 布哈林论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162.
- [5] 郑永廷, 任志锋.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研究 [J]. 教学与研究, 2013 (7): 46.
- [6] 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13-11-16 (01-03).
- [7] 本社通讯员.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N]. 人民日报, 2014-04-16 (01).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9.
-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79.
- [10] 纪宝成. 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的几个问题——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50周年 [J]. 教学与研究, 2003 (5): 13.
- [11]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N]. 人民日报, 2013-08-21 (01).

【英译转至第36页】

# A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espons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Micro – blo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Science

## —A Case Analysis of Changzhou Government Micro – blog

LI Pei – ju<sup>1</sup>, SIMA Shuang – long<sup>2</sup>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The responsiveness, a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good gover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democracy, is a necessary factor in creating a service government. As a new platfor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he government micro – blog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strengthening the responsivenes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and level of government services. However, the current cas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responsiveness of the government micro – blog is weakened as a result of backward management idea and inappropriate method. The information released is too general and the responses are weak,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It is feasible to improve the interaction and responsiveness of government micro – blogs through the renewal of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specific operation methods for the long – term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micro – blogs.

**Key words:** government micro – blogs; responsiveness; response mechanism; Changzhou

(责任编辑: 刘志新)

【上接第 31 页】

# The Thought of Proletariat's Cultural Leadership of Bukharin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s

ZHONG Shuai, CHEN Kun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Institut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In 1925, Bukharin proposed the proletariat's cultural leadership in his paper The Proletariat and Their Policy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necessary cost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danger of regime metamorphism are necessary for the acquirement of leadership because of the long – term nature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e proletariat is not yet mature in culture, which is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for the leadership. The connotation of Bukharin's cultural leadership is the abilities, influence and potentials of the proletariat to lead the nation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He proposed the methods to obtain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First, we should correctly treat “non proletarian writer”. Second,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elf – educ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Third, we should stick to the genera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carry out a wide range of competitions. We can get three points of enlightenments from that. First,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overall outlook of national security, safeguard the national cultural integrity. Second,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and inclusiveness of mainstream ideology. Third, we mus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paganda cadres.

**Key words:** Bukharin; cultural leadership; contemporary value

(责任编辑: 刘志新)